

早期越窑

林士民 林浩◎著



中國越窑瓷

上

— 早期越窑成熟时期 — 早期越窑发展时期 — 早期越窑繁荣时期 — 早期越窑停滞时期 — 早期越窑衰落时期 —

宁波出版社

中國越窑瓷

上

早期越窑

林士民 林浩 著

宁波出版社

林士民

研究员，获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发掘领队资格。

1934年出生，1953年毕业于浙江省立锦堂师范，从事考古工作近40年，曾任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早年参加河姆渡遗址发掘，在史前考古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并致力于越窑、青瓷研究，出版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著名海港——明州》、《青瓷与越窑》、《三江变迁——宁波城市发展史》、《万里丝路——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合著）、《再现昔日的文明——东方大港宁波考古研究》等专著。《青瓷与越窑》成为国内外第一本研究越窑的专著，在业界享有很高声望。受日本、韩国、东南亚诸国邀请多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考古成果多次获省市优秀成果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录自《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20年发展历程回眸》专家团队条

林浩

女，1970年生，浙江宁波人。毕业于浙江大学机械系，后进入复旦大学文博系深造，陶瓷研究方面师从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克伦研究员，在职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现为宁波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科技保护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中国古陶瓷学会会员，主要从事古陶瓷和古建筑及石刻方面的研究保护。

发表的相关论文有《浅析上海博物馆青铜器陈列馆的光照、色彩与陈列》、《宁波象山港古铁锚化学成分及腐蚀机理分析》、《从纪年器看“早期越窑”青瓷的分期与特点》、《越窑制品的外销》、《“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遗产——上林湖越窑青瓷》、《宁波出土白瓷的研究》、《宁波出土磁州窑（系）瓷器的研究》、《保国寺古法保存探源》、《宁波明代民居建筑鉴析》、《宁波东钱湖南宋墓前石刻研究》、《唐国宁寺纪年双塔浅释》、《唐代四大海港之一“Djanfou”不是泉州是明州（越府）》等。



中國越窯瓷

耿寶昌題



耿寶昌 故宮博物院研究員、中國古陶瓷學會會長、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副主任

中國越窑瓷

鲍贤伦题



鲍贤伦 浙江省文化厅副厅长、浙江省文物局局长、
浙江大学教授、著名书法家

《中国越窑瓷》一书，对瓷窑遗址、居住遗址、墓葬中出土的大量陶瓷标本以及从沉船中打捞起来的几十万件越窑制品进行多层面深入研究，是一部大作，也是一部对越窑瓷全方位研究的专著。《中国越窑瓷》与《青瓷与越窑》是姐妹篇，都对越窑瓷业的历史发展和越窑瓷制品的研究作出重大的贡献！

《中国越窑瓷》是继《青瓷与越窑》之后的又一鸿篇巨著，该书全方位研究和审视“早期越窑”和“越窑”制品的器物类型、胎釉变化、装饰纹样、装烧工艺等进行对比研究，并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制品特点进行科学的分期与论述。

该书在《青瓷与越窑》的基础上，提炼出推动制瓷业发展的亮点，作出全面论述与分析，并重点放在器物的鉴定与鉴赏对比研究上，这在越窑制品的研究中属于深层次的研究，值得赞赏。这样的研究力作，我们应该给予高度的评价。

《中国越窑瓷》一书，首次提出“早期越窑”与“越窑”这一全新概念，并根据研究成果提炼后把“早期越窑”分为成熟、发展、繁荣、停滞、衰落几个历史时期；“越窑”篇经深入研究，也提炼归纳为复苏、发展、鼎盛、衰落几个历史时期。上述这些分期都是深入研究的成果，有其独到的见解，非常难得，过去还没有这样深入的研究，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

关于“早期越窑”与“越窑”发展的原因，该书也作了详尽的分析，指出除了宁波港的发展外，另一个促使窑业发展的原因，是东西方文明对话的开通，促进了文化、贸易的发展与交融。西方胡人在“早期越窑”制品中的大量出现，说明了宁波、绍兴这些地方早已是中西文化交融的热土，其影响已深入到制瓷领域了。

该书总结了从东晋到隋代三个多世纪早期越窑停滞、衰落的原因，提出“越窑”复苏期中匣钵的发明使用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作者通过大量的定性定量窑址遗存分析，提出在越窑的鼎盛时期越窑发展趋于全国领先地位。

“贡窑”的设立，“秘色瓷”的烧造，对推动和促进我国瓷业的发展意义非凡，在国内外影响极为深远。



《中国越窑瓷》一书，在整个论述中还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新看法。如提出了绿釉制品的新课题、越窑也使用化妆土的问题，非常新颖。特别是运用大量的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证实越窑衰落于北宋晚期的结论，很有说服力。在研究越窑外销陶瓷中，作者对每一处的制品都作了考证对比，从中得出越窑制品外销到北宋早期的科学结论。

值得注意和重视的是《中国越窑瓷》一书还有如下的一些特点：

首先，作者运用考古类型学方法，把“早期越窑”与“越窑”的制品进行鉴定与鉴赏，并作出深入对比研究，从中归纳出鉴定标准与注意事项，这是该书最突出的一个特点，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其次，该书作者在定性定量分析研究梳理中，以纪年器为依据，使每一个历史时期的制品特点、特征更为清晰，成为鉴定的要领，这又是该书的另一个特点。

值此《中国越窑瓷》即将出版之际，我们为该书出版感到高兴，也感到自豪。我们知道，越窑瓷及其制品，在我国古代瓷业中无疑是先进文化的代表，也是中华民族优秀陶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对优秀越窑制品进行全方位的深入探索研究，对弘扬和继承中华民族优秀陶瓷文化，推动和促进中国陶瓷史特别是越窑青瓷发展史的研究，加强和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承林士民、林浩同志不弃，要我为该书作序，现不揣冒昧，略赘数言，不妥或谬误之处，敬请方家指正。是为序。

2010年9月12日于厦门大学

作者系厦门大学教授、中国古陶瓷学会前会长、中国古陶瓷学会名誉会长

《中国越窑瓷》的作者是宁波地区两代考古工作者。老林先生是资深的文物考古专家，执着于事业，勤勤勉勉，成果颇丰。小林姑娘聪敏好学，笔耕不辍，让人感到后生可畏。

越窑在中国陶瓷发展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学术界对此是一致公认的。上世纪80年代法门寺地宫瘞藏的唐代越窑秘色瓷的出土，在撩开千年神秘面纱的同时，也催进对越窑瓷的探究。近十余年中国相关学术活动尤为活跃，中国古陶瓷学会，中国硅酸盐学会，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博物馆，宁波市及慈溪市、上虞市的文物部门，还有民间博物馆和社会研究人士，多次举办关于越窑的不同层级或规模的学术研讨会议。不少境外专家学者也跻身其中。可以说，越窑瓷是具有国际影响的学术课题，迄今研究成绩堪称可观。相对而言，综合研究并著述的，还不多见。林士民先生与林浩同志共同著述的《中国越窑瓷》，是一部综合性的专著，其面世应会引人注目的。

对于越窑范畴及概念的界定，学术界历来认识不一，各有其道理。但这是研究越窑瓷首先要设定的。本书作者依据宁绍地区的历史地理、社会变迁以及陶瓷生产状况，将越窑的范畴括定在东汉至北宋晚期，从中又划定为“早期越窑”（东汉到隋）与“越窑”（唐到北宋晚期）两大时段。在每大时段中，又依据过程所呈现的阶段特征，分别划定若干时期。这种划定方式既在时间与空间上涵盖中古时期的“越州”，也在观念和传统上兼及上古时期的“越”，其一定的道理，是比较符合宁绍地区瓷业发展实际的。

作者是考古工作者，谙熟考古学中的类型学方法。将这一方法学运用于越窑瓷的研究与叙述，便形成本书的一大特点。作者以瓷窑遗址、居住遗址、田野墓葬出土以及沉船打捞出数十万件越窑瓷器为基础，以纪年墓（纪年器）为标尺，以型分类，以式排序，从器物造型、胎釉变化、装饰纹样、装烧工艺等各个方面，对于“早期越窑”与“越窑”的各个分期中的制品作了对比研究，分析指出其中的发展脉络与演变规律，从而对越窑的断代、分类、排序、分期等问题给出了系统性的结论。对于陶瓷考古中的叠压



关系、共存关系以及外销瓷的年代考证等也作了精彩阐述。

《中国越窑瓷》的出版，不仅为中国古陶瓷研究领域添一佳作，为专业研究人员提供了丰富的考古信息，也为业余爱好者提供了有益的鉴赏依据。值得品读。

谨为序。

庚寅年深冬

作者系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中国古陶瓷学会常务副会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

越窑在中国古代陶瓷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不仅因为越窑所在的浙江宁绍平原一带是中国瓷器的主要发源地之一，而且越窑还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青瓷产地。

本书依托《青瓷与越窑》的学术成果，从介绍和鉴赏的角度出发，对自东汉至宋代各个时期越窑产品的特点进行对比和介绍，图文并茂、深入浅出。作者以有纪年的出土文物为依据，对越窑瓷器进行断代和分期。书中还披露了许多新的考古成果和资料，为研究提供了新的科学证据。

瓷器的特点包括造型、装饰以及工艺各个方面，造型和装饰特点往往与不同时代和地区不同的生活习俗和流行时尚相关，而工艺特点则与制作工艺的时代特征有密切的关系。本书作者从所掌握的丰富考古实物和历史文献资料出发，对不同时代、不同类别、不同造型的越窑瓷器进行详细分析，总结出器物的时代特征。

作者结合窑址及出土遗物情况，首次提出把隋代以前的“早期越窑”发展分为成熟、发展、繁荣、停滞和衰落五个历史阶段；把唐至北宋晚期的“越窑”发展分为复苏、发展、繁荣和衰落四个历史阶段，并且对其历史原因进行了分析。书中还对越窑衰落的时代和原因进行研究，提出越窑至晚烧制到北宋晚期。至于上林湖地区出现的南宋“开刀山”类型青瓷，作者认为是与传统越窑没有关系的另外一类瓷器，不应把它归入越窑的范畴。这与笔者在《关于宋代越窑的研究》（载《中国陶瓷全集8宋〈下〉》，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11月版）一文中提出的观点不谋而合。对于一本以普及传播为目的的书来说，包含了许多学术研究的内容是难能可贵的。

本书作者之一的林士民是我敬重的学术前辈，他在宁波地区从事文物考古工作几十年，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我认识宁波地区的文物博物馆是从林先生开始的，1982年9月我陪一位中央领导考察浙东地区的文物博物馆，宁波地区的业务陪同就是林士民先生。他对宁波的每一处文化遗产都了然于胸，用口音浓重的宁波官话娓娓道来，十分生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本书的另一位作者林浩是我90年代在复旦大学任教时的学生，毕业后也



一直工作在文物考古第一线。看到学生在学术上取得成绩，作为老师感到由衷的高兴。本书可以说是林先生两代人从学术成果中提炼出来的学术与鉴赏兼备的优秀文物著作。可以期待，本书将在普及越窑瓷器知识方面发挥极大的作用，从而推动古陶瓷研究乃至古代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继承。

2010年9月23日

作者系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副馆长，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

导 论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其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古迹遗存对我们研究中国乃至整个人类历史都有重要的意义。考古学是根据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物质资料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学科，《中国越窑瓷》一书，便是尝试运用从瓷窑遗址、居住遗址、墓葬中出土的大量陶瓷器以及从沉船中打捞起来的几十万件越窑制品进行科学的排列对比，找出器物的特性和共性，以期对中国古代陶瓷文化进行补充深化。

在古陶瓷的研究领域中，不管是陶瓷生产工艺、装饰艺术还是窑炉结构、作坊遗迹，归根结蒂，最终都落实到陶瓷制品这个具体的载体上。

在实际工作中，判断一个窑场、一个作坊的具体年代；判别遗址中人类活动遗迹、遗物抑或在古代墓葬中大量的随葬品，首先接触到的也是陶瓷制品，要断代，只有透过具体的表象挖掘出其内在的特质，才会更加准确。

纪年器或纪年墓中出土的制品最为重要，它为我们断定绝对年代或相对年代提供了一个标准器。《中国越窑瓷》一书的撰写，是建立在《青瓷与越窑》全方位研究的基础上，以公开或未公开发表的纪年墓（纪年器）及遗址中出土的器物为主，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对“早期越窑”和“越窑”的制品从造型、胎釉变化、装饰纹样、装烧工艺等进行研究，并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制品特点进行科学的分期与阐述。全书共分两大块内容：

一、对制品研究成果进行提炼

从纪年墓、遗址中出土的器物着手，参考前后相关的陶瓷制品，通过对比总结提炼，找出这一历史时期中推动“早期越窑”和“越窑”发展的历史上的主要亮点和陶瓷发展史上的关键问题，分列成“早期越窑”和“越窑”两大方面和若干章节进行阐述：

（一）早期越窑

“早期越窑”（东汉到隋）的发展经历了成熟、发展、繁荣、停滞和衰落，根据这五个历史阶段，分别列出“早期越窑”的成熟时期（东汉）、发展时期（三国东吴）、繁荣时期（西晋）、停滞时期（东晋）和衰落时期（南朝至隋）五章，并对每期瓷业发展的亮点进行概括后列出小节。

1. “早期越窑”成熟时期。将原始瓷发展到成熟瓷器列为第一节，指出它们的发展是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制陶与制瓷行

业的分家，并通过对制品的科学测试证明：“早期越窑”从陶与瓷分家后的发展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

2. “早期越窑”发展时期。其历史背景，其一是因为宁绍地区发达的经济推动了制瓷手工业的发展；其二是因为宁波（句章）港从汉代开始就成为汉、吴、两晋时代东南沿海的一个主要港口，丰富的物产（原料）和发达的科学技术，使烧制的大量早期越窑制品，通过畅通的千里水道运销到大江南北。吴地大量制品的出土，就是最好的历史见证。

瓷业发展的另一个动力是海外交往，具体体现在吴、西晋时生产的堆塑罐上那些惟妙惟肖的西方胡人活动形象和狮、象等吉祥物出现，也同时说明宁波（句章）港通过海上交通，东西方的“文明对话”已经开通，这些制瓷领域中频现的异域元素充分反映出当时的浙东已是中西文化交融的热土。

3. “早期越窑”繁荣时期。瓷业发展兴盛，制品中动物形象的运用也达到了鼎盛。西晋瓷业发展中动物形象制作的成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动物形象、拟形类动物和装饰类动物三个方面的塑造均各具特色，典型制品既丰富多彩，又一脉相承，成为艺术史上一朵奇葩。

4. “早期越窑”停滞时期。主要是指东晋时期，瓷业停滞的历史原因在于社会大动荡和经济萧条。大量纪年墓出土物表明，停滞时期不但瓷业窑场大减，生产停顿，西晋时各类陪葬品到东晋时期已基本绝迹，制品器形、装饰都承袭了西晋晚期的模式，变化不大。

5. “早期越窑”的衰落时期。步入南朝至隋，浙东瓷业趋向衰落，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第一，窑场数量巨幅缩减。从南朝到隋，仅有作坊12处，也就是说从南北朝算起长达160多年，隋仅30多年，二者加起来近两个世纪，就此几处作坊，明显反映了浙东早期越窑的衰落，若加上东晋停滞100余年，实际上在长达三个世纪中都根本无暇谈及发展。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封建社会里手工业生产要积累与创新，只有在安定的社会环境中才有可能做到。

第二，制品的品种大减，仅够供应本地区的需求，出现在纪年墓的陪葬品也只有寥寥数种。

（二）越窑

对“越窑”的研究主要是唐到北宋晚期。根据出土的纪年墓（纪年器）、遗址的大量遗物及陶瓷生产过程的对比、归纳，我们首次提出“越窑”发展过程经历了复苏、发展、鼎盛和衰落四个历史时期，并据此分为四章，以每一阶段制品发展历史为依据，从宏观上进行全方位的审视，从中提炼出促进瓷业发展的历史亮点。

1. “越窑”复苏时期。大量发掘资料表明，越窑匣钵是在中唐晚期出现的。这种突破明火裸烧而使用匣钵装烧的工艺革新，应是装烧工艺变革中的一大进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由于匣烧可以使窑炉高度增高，长度延伸，不仅大幅度提高产量，更重要的是使越窑制品质量得到极大的提升，尤其是釉色气氛的改善，开创了制瓷工艺的新局面。这种从明火裸烧向匣烧工艺迈进的历史性进步，正是越窑工匠的伟大创举。

2. “越窑”发展时期。该时期的明显特点在于朝廷的重视，率先在

上林湖窑场设置“贡窑”，烧制“秘色瓷”。在慈溪越窑中心产区的窑场中，出土了书写贡窑设置的墓志罐。贡窑设置的历史事实，证实了先进的制瓷技艺对当时各地窑场有着极大的影响。同时还对“越窑”的装饰艺术进行了概括论述，描述了发展时期越窑制品上各种装饰的具体手法。

3. “越窑”鼎盛时期。该时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窑业发展迅速，渐渐处于全国领先的地位。五代北宋初期，“越窑”遥遥领先不仅表现在作坊大增，制品品种也丰富多彩，许多纪年墓中的出土物均可见证。越窑制瓷业的飞速发展，依赖于江南吴越的社会安定、经济发达和文化繁荣。作坊猛增至百余处，先进制瓷技术成为国内青瓷的宗师；越窑技艺向国外传播，成为世界学习的先导。

(2) “贡窑”的发展达到鼎盛。从文献得知，每次上贡越窑制品数以万计，甚至多达十四万件，贡奉品种、数量之多和质量之高有史以来极为罕见。大量贡窑作坊遗存也表明，从晚唐开始上贡，到五代和北宋初期，越窑贡奉时间长达300余年，贡奉制品遗存丰厚，所贡制品中，包括众多的金银扣陶瓷器，均为上林湖“贡窑”生产，由于贡奉数量日增，又在明州府东钱湖设窑烧贡瓷，其制品远比上虞窑寺前窑精致得多。

(3) 越窑制品涉足五湖四海。从晚唐开始，越窑制品远涉重洋进入世界市场后，成为珍稀品之一。中国的越窑瓷器，跻身于珍贵的金银器、丝绸制品行列，被各国人民视为珍宝，因此贸易陶瓷的供应面不断扩大，输出的数量大增，也大大刺激了越窑瓷业的发展。上林湖五代北宋作坊中，不但保存的遗存相当丰富，而且制品质量也相当高。输出的数量，印度尼西亚井里汶海域沉船中打捞上来的（五代北宋初）越窑青瓷达三十余万件，在台湾澎湖一地港口出土了三千余件五代时期的越窑精品，输出量之大可见一斑，这也是上林湖、东钱湖窑场生产贸易陶瓷兴盛的历史写照。

(4) 越窑也烧造绿釉瓷。通过对宁波地区象山、宁海、上林湖等地出土的一批绿釉瓷器进行对比研究，我们认为是越窑的制品。此为抛砖引玉，希望成为越窑研究的又一个新课题。

(5) 越窑化妆土的使用。我们从藏品与瓷窑遗址中，多次发现越窑制品中确实存在使用化妆土的现象，这又是一个值得关注和重视的新问题。

4. “越窑”衰落时期。大量的历史遗存结合文献，对以往衰落的种种缘由给予科学分析后，认为越窑的衰落另有其原因。越窑的衰落，曾经最流行的当属“龙泉窑的兴起导致越窑的衰落”论。

大量的考古资料证明，龙泉窑的创烧始于北宋晚期。《龙泉青瓷研究》中的“龙泉青瓷简史”、“龙泉大窑古瓷窑遗址发掘报告”、“龙泉金村古窑址调查发掘报告”等，均根据考古地层和纪年器的判断，将龙泉窑烧制青瓷的上限年代定在北宋中晚期，在《龙泉窑东区窑址发掘报告》中，对龙泉窑中的紧水滩库区窑、山头窑址群、大白岸窑址群、源口窑址群等进行了分析，根据出土文物和纪年器的对照排列，亦得出“各期器物的特征，第一期中的第一段的年代为北宋晚期，第二段为北宋末期；第二期中的第三段为南宋早期……”的结论，明确指出龙泉窑中上述窑群其生产年代的上限是在北宋晚期，即龙泉窑业始于北宋晚期。

上林湖越窑真正衰落在北宋晚期，而此时的龙泉窑刚处于创烧阶段，

是属于就地销售为主的小规模生产，南宋以后才开始繁荣乃至鼎盛。故北宋晚期的龙泉窑根本不足以与越窑抗衡，因此越窑的衰落，也不可能是在与同行龙泉窑的竞争中失利所造成的。

笔者认为越窑衰落首先是与北宋朝廷“官窑”的设立、贡瓷的重新定位以及越窑自身的缺陷有关；另一方面，到了北宋晚期，景德镇的青白瓷、定窑的白瓷、耀州窑的各种青瓷以及汝窑、钧窑制品等，在上贡朝廷和商业销售中都占据了一定的市场份额和地位，作为停贡半个多世纪的越窑青瓷，根本无法与上述窑口制品相竞争，所以只能渐渐地退出历史舞台直至消失。

在衰落期中，我们专门设一节讨论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再次提出了越窑在北宋晚期已渐趋衰落直至停烧而并非在南宋尚在烧造的论点。

在宁波慈溪古银锭湖低岭头、寺龙口窑址试掘和发掘，发现了南宋龙窑窑炉和产品，不但把越窑的烧造历史下限由北宋晚期推进到南宋，而且把南宋初烧造宫廷用制品也划入越窑，故有了“越窑烧造时间延续到了南宋”的说法。但细究后我们发现，这个南宋龙窑及其产品虽属于南宋初宫廷专用制品，但并非是传统的“古典式越窑”。就像许多学者指出的“从寺龙口产品特点来推断，该窑南宋初的产品显然不是对北宋及其以前传统越窑古典青瓷的直接继承……由于这些产品已经改变了越窑瓷器的传统风貌，所以从品种上考虑，我们不再把它们放在传统的越窑系统之中”。

寺龙口发掘报告中也指出“第五期（即北宋晚期的元丰年间至宋末）粗糙制品明显增多，大量出现韩瓶等低档产品……多数则明火叠烧，古典式青瓷正走向衰落”。发掘者在《越窑瓷》中关于越窑青瓷分期，也只有“唐早期、中期、晚期，五代，北宋早期、中期、晚期”七个期，并没有把南宋朝廷设窑烧制宫廷用瓷的器物纳入越窑范畴。对此，笔者同样认为越窑衰落于北宋晚期，并且通过北宋晚期一批典型窑址标本认定，衰落的具体时间应在北宋政和年间。

从堆积的制品、窑具分析，在陶瓷窑遗址考古中，废品堆积的地层与窑炉中的堆积相比，无疑是窑炉中堆积的制品和窑具意义大得多。地层的叠压关系并不代表承上启下的关系。因为虽然是叠压，但是否是原生堆积，就会有很大的差异。我们认为废品堆积“共存”制品，未必是一个窑一个时期烧造的制品，目前所看到的虽是烧造宫廷专用制品的窑炉，但从制品类型学角度看，所烧制的一些南宋宫廷用瓷，无法归属于传统正宗的越窑范畴。这儿笔者仅仅是作个扼要的叙述。

目前海外出土不少越窑制品，我们对出土器物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外销的大多为晚唐、五代和北宋早期的制品。可以说，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北宋时期中、晚期的制品，读者若把早期制品当作晚期制品来看待其错误是比较明显的。为了便于对海外越窑制品进行鉴定，特设“陶瓷之路”通四海一章，以减少鉴定中容易出现的误判。

二、考古类型学的运用

《中国越窑瓷》一书，把深层次的研究成果用通俗的语言进行深入

浅出的表达，因此文中不会出现像考古报告中的类似分型、分式等专业名词，而只是从考古类型学的方法着手，对制品进行分析对比，从中找出每一个历史阶段制品的演变及发展规律、特点与脉络。在每一个时期或者是历史阶段，以纪年制品和纪年墓出土的制品为主体，有机地联系它们前后相关的制品，从而对同时同类的器物进行类比，便可看出它们变化的特征与特点，这样的断代应该更为符合历史。所以在每一期中我们都专门安排了器物的鉴定要领进行描述，从中也可以看出一种器物的演变规律。我们认为，这样的尝试在越窑制品研究上尚属首次，也是研究工作深化的一种表现。为了使器物断代更为正确，我们只能用类型学手段来探索这类制品在这个年代中的众多信息，包括制品的造型、胎体、釉子、装饰艺术、装烧工艺等，以得到更为正确的结论。

越窑器鉴定与鉴赏中的“典型器物剖析研究”也值得重视。一些纪年墓或纪年遗址中出土的越窑制品，一般都把它当作相对标准器看待，但是作为一个专业工作者就必须对所谓的“共存”物用“金睛火眼”去辨别，否则就要上当，这在文中有典型举例：

如吴时制作的人物堆塑罐，葬在东晋永昌元年（322）墓中，是不能把它当作东晋器物的；在北宋“太平戊寅”铭的塔基中出土了唐代的盖盒，我们不能把它看作是太平戊寅时的器物；我们也不能对北宋早期上林湖出现的鸚鵡纹、莲瓣纹、缠枝花纹、双龙抢珠纹等轻易下结论，以为是北宋晚期常见的纹样。有的伴出的“太平戊寅”等纪年器是可供借鉴的，但这类纹样和器形若出现在晚期堆积中，就把它当成晚期的制品实属不妥，这些都需要我们专业或业余鉴定者认真思考。

制品类型，这是一个鉴定者必须要了解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碰到的有“越窑制品”、“越窑系制品”，还有“越窑风格的制品”，在鉴定中首先要搞清楚它属于哪一类。在文化交流层面上，首次提出存在浅、深两个层面，技术交流属于深层次的交流，它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值得我们专业工作者重视。

《中国越窑瓷》一书，分上下两册，上册为“早期越窑”，下册为“越窑”，除近二十万文字外，还配了七百余幅照片，二百六十余件器物线图，图文并茂，供读者互相对照。《青瓷与越窑》和《中国越窑瓷》是姐妹篇，前者属全方位研究的专著，后者是旨在为鉴定与鉴赏者提供一定深度的参考书。

越窑制品在古代制瓷业中，无疑是先进文化的代表，在今天对越窑制品进行探索研究，可以继承和发扬该文化的精髓，从而为繁荣我国的文化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國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國。其悠久的歷史和文化，和豐富的文物，遺存對我們研究中國古史，乃至整個人類歷史，都有重要的意義。

我，考古學就

越窑瓷

出土的

到北

史進

生產

都反映

一個窑場

物抑或在古代墓葬中大量的隨葬品中，首先接觸到的也是陶器。



門學科。《中國

址、墓葬上

越窑（五

代陶器

是研究吃

歸根結

際工作中，對

人類活動遺迹

首先接觸到的也是陶器。